

想不到黎智英同美國勾結那麼深

議論風生

鄭憶路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一案自去年12月18日開審以來，至今已開庭審訊了逾60場。隨着控方在庭上公開案情，揭開各被告的千絲萬縷關係，以及諸多內幕詳情，黎智英與美國的勾連之深、涉及領域之廣，令人深感「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在黎智英與美國「互惠互利」的過程中，黎智英為美國「以港過華」的政治野心提供諸多協助，美國亦通過黎智英在港滲透政治勢力，令香港一度深陷「港版顏色革命」的泥潭。

根據控方公開資料，黎智英與美國的勾結縝密且複雜。首先，黎智英通過其助手建立起一條完整的美國政治人脈，藉此為其反中亂港事業做好鋪墊。黎智英的私人助理兼顧問Mark Simon早前被證實為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及中情局前僱員，與美國駐華大使關係密切。作為「中

間人的中間人」，他協助黎智英與美國多名政要建立緊密聯繫，並多次陪同黎智英在港會見美國政客。他還曾代表黎智英聯絡境外反華勢力，其中包括美國前軍方人員及「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創辦人，而後者已經多次對香港法治進行毫無根據的抹黑與造謠。

除了建立美國方面的政治人脈，黎智英亦着手培養本地反中亂港勢力，為其精心打造的「國際線」輸送「攪炒人才」。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為美國政客引見多名參加黑暴的「前線」年輕人，通過這種「斷章取義」的方式向美方傳達錯誤信息，以掩蓋主流民意對黑暴、「港獨」的抵制，從而引導美方對香港的社會動亂予以更多支持。

早前意圖潛逃台灣而被廣東海警拘捕的「十二港人」之一的李宇軒，亦是黎智英為「國際線」拉攏的「人才」之一。據悉，因李宇軒曾經拜訪過聯合國人權事務

高級專員辦事處、且為「攪炒」組織成功募集到大量資金，因此頗為得到黎智英的「器重」。在黎智英所規劃的三條「國際線」中，最為重要的「美國線」便是交由李宇軒負責。黎智英授意李宇軒頻密與美國政客會面，以「年輕示威者」的身份博取同情、積極游說美國等西方國家向香港甚至中央實施「制裁」。

其次，黎智英為向美國證明自己在港的政治價值，通過不同渠道為美國反華反港的行為進行造勢，並且多次在公開場合呼籲美國制裁香港、煽惑本地輿論風向。黎智英在2020年接受外媒採訪時，曾明確提出要求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制裁」香港。他還曾在另一場採訪中表示，若中美發起冷戰，他將「為美國而戰」、「為美國犧牲一切」。2020年5月《蘋果日報》英文版推出後，黎智英向其編輯部授意要在新聞中煽動美國人民的反中情緒，並要求編輯部要多報道內地的負面新聞以達到

「給美國敵對中國的更多理由」這一險惡政治目的。

在鋪排「國際線」一事上，黎智英暴露出其作為政治掮客極度狡猾的一面。他深諳國際社會的底線是不能鼓吹暴力，因此他一方面積極拉攏一些立場激進的人士，通過承諾會為其「鋪好後路」慫恿這些人攪亂時局，一方面又通過Mark Simon授意李宇軒等人在會見西方政客時不要提及立場較為激進的「攪炒團隊」，以免削弱國際社會對黑暴的支持。

第三，在近年來美國對香港實行的多次所謂「制裁」背後，黎智英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美國參議院表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前夕，由黎智英牽線促成了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與目前流亡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會面，其後《蘋果日報》更是以「訪港力撐」等煽動性標題為這份所謂的「人權法案」造勢。黎智英利用其在美

政治人脈，為美方對港實行所謂「制裁」提供大量資訊及本土政治聯繫，對香港的國際聲譽造成嚴重損害。

在黎智英被捕之後，美方曾多次聯合不同勢力，包括美國政界、宗教界、新聞界等為「營救」黎智英向特區政府施壓。作為美國在香港最重要的政治代理人之一，黎智英被囚意味着美國在港「深耕」多年的政治資產恐將付之一炬。而恰恰是這些「營救」，再度證明黎智英與美國的勾結是如此深厚。

隨着案情細節被陸續公布，可以看出，黎智英不僅心甘情願成為美國的政治代理人，為配合其「以港過華」的戰略作出各種政治活動，還主動為美國製造「合理」干涉香港事務的理由，通過其所掌握的壹傳媒不斷美化「港版顏色革命」、美化美國對香港無恥的政治干預。這些行徑必將得到香港法律的公正審判。

時事評論員

優化人口政策「拚經濟」



議事論事

朱兆麟

筆者近日出席香港發展論壇舉辦的「拚經濟，如何拚？」研討會，其間與會嘉賓除了指港人不應「活在歷史輝煌」，要善用優勢開拓機遇外，更爆出「香港人來來去去都囉幾把聲」、「說了很久都沒人聽，因為我們都只是在這裏說說而已」的「soundbite」，同時也帶出了香港人口政策的問題。

「只是在這裏說說而已」，正因香港過去缺乏宏觀、全面的人口政策和產業藍圖。本會去年發表的文章曾指出，「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過分聚焦「人力資源」，使「人口政策」集中經濟效益，未能宏觀檢視產業需要，以及整體香港社會的居民福祉。人口政策應以改善港人生活為目標，故政府的人口政策應以此制定關鍵績效指標(KPI)，與經濟增長、個人收入、工作時數、生產力、家庭幸福等指標掛鉤。有了KPI，亦有助向市民解釋對整體社會帶來的福祉、凝聚共識，避免「說了很久都沒人聽」。

不能等待人才自行來港

目前特區政府在「搶人才」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包括透過高才通等計劃吸引人才來港工作和定居、放寬入境人口規模，卻未有如新加坡般制定目標為本的具體人口政策，按自身需要、更有效去控制人口結構和數量。

新加坡設有「高階就業准許證」(Employment Pass)或「企業准許證」(Entrepreneur Pass)，為高技術人士、專才計劃或投資計劃入境者提供申請永久居民資格。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需積極吸納各行各業的代表、專家意見，深入了解不同產業的人才短缺情況和需要，再集中制定戰略，與相關政策局擬定重點吸引所需人才的執行政策。

另一方面，目前少數族裔佔香港人口約8%，不少人都是45歲以下的年輕勞動力，特區政府可聯同社會組織、僱主，合力舒緩其就業、融入工作環境的困難，包括考慮成立專門基金，津貼他們學習廣東話，以助其穩定留在工作崗位。

正如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所言，「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面對鄰近城市的積極競爭，香港過去靠國際名氣，等待中外人才自行來港的一套早已行不通。但香港勝在有背靠祖國，以及「國際線」的獨特優勢。要重點吸納人才，特區政府與商界可加強與內地大專院校，以至內地高科技產業園區和科研機構合作，安排適合的內地學生和專業人士到港學習和工作，為其申請成為永久居民資格提供專門途徑。另一方面，亦可安排香港的學生和人才，與內地相關企業對接，提供實習及培訓機會。透過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人才流動「旋轉門」，既可為兩地人才提供更豐富的發展機會，亦可為香港的產業發展提供更廣闊的人才供應。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步伐



新民政道

何敬康

香港在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形勢下，未來需要大量土地以迎合發展需求。而在全球經濟放緩，特區政府財政連年赤字，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新民主黨一直主張特區政府應優先發展北部都會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在財政預算案提出未來五年，每年發債約950億至1350億元，推動北部都會區及其他基建項目，這是特區政府推動香港長遠發展的務實和負責任之舉。事實上，對於香港的中長期發展、經濟轉型和與內地經濟進一步融合而言，北部都會區比其他項目更加切合需要。

香港和深圳僅一河之隔，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深圳由大片農地開始，到設立經濟特區，一步一腳印地萬丈高樓從地起，近十多年間更加蛻變成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和高科技企業集中的大都會。香港基於其轉口港發展歷史傳統原因，經濟活動集中於維港兩岸，

以及荃灣、葵青及觀塘等第一代「衛星城市」，與深圳接壤的新界北發展卻相對滯後。這種反差，可說是一種浪費，沒有用好「一國兩制」的優勢，沒有好好運用與深圳的毗鄰關係，去為港深兩地創造更大協同效應。

助力灣區進一步互聯互通

北部都會區正好是一個黃金機會，為新界北部帶來巨大建設動力，讓香港的經濟核心從港九輻射到新界，為新界北部尤其是一些偏遠地區增添發展動能。同時，新界是既有土地，不用花更大費用填海造地之餘，亦已存在不少基建特別是來往粵港兩地的大型交通配套，除目前的兩個鐵路過境口岸、皇崗、深圳灣、蓮塘、文錦渡、沙頭角等人車口岸和周邊設施外，特區政府已有計劃新建一條鐵路到前海，還有落馬洲支線北環線延伸工程，加上目前在重建中的皇崗口岸和已經提出重建計劃的羅湖口岸都將實施「一地兩檢」，兩地通關手續進一步簡化，都對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更為有利。

另一方面，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助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三個不同行政管轄區在出入境及海關檢疫區、關稅區，人員人才來往、貨物來往、

數據來往等方面進一步互聯互通，具有重大的策略意義。

北部都會區發展對香港既是發展機遇，也具戰略意義，筆者希望特區政府在規劃和落實發展的過程中，避免重蹈過去一些發展計劃的覆轍，不要使北部都會區變成一個地產發展或公營房屋項目，而應該全面地籌劃如何可以利用好這片土地，包括仔細想好怎樣可以吸引更多內地旅客到北部都會區消費和享受各種服務？怎樣可以利用北部都會區吸納內地高新技術產業落戶？怎樣可以使北部都會區為內地企業更好地提供各類型金融服務？怎樣可以使北部都會區匯聚更多本地和內地海外人才和高消費階層，帶動新界以至全香港的經濟活動？

特區政府要積極推動北部都會區和深圳進行有機結合，讓兩地可以互相配合又互補不足，有效地促進兩地人才、資金、技術等來往流動，令港深兩地可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和輻射全國的優勢，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從而使兩地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令經濟發展踏上一個新台階，更為國家富強貢獻一分力。

新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實事求是處理垃圾收費問題



靜思明路

黃穎淵

因此，堆填不僅是對環境造成污染，也是在浪費我們珍貴的土地資源，這是垃圾問題造成的主要矛盾。

無可否認，現時港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都是「零成本」地製造垃圾，這些表面上的經濟誘因或多或少是造成整個香港「垃圾圍城」的原因之一，也令我們忽略了在製造垃圾的同時，消耗了生態環境，並危害了下一代的生存環境，這在公共經濟學中被稱為「外部成本」。

本港現有有三個堆填區預計將在2030年達至飽和，實行垃圾收費的目的也是針對固體廢物過多的情況，對污染等主要矛盾進行改革，而非單純向市民收「垃圾稅」，是實行污染者自付，改變市民的生活習慣，以達到在源頭減少廢棄物的目的。

但實行污染者自付、源頭減廢，並不代表

我們能馬上解決問題，這需要一個過渡期，在過程中更會不斷發現問題，例如不同大廈的垃圾處理問題、回收配套不足、垃圾袋大小，以及大型垃圾棄置等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有關部門逐一解決，市民也需要時間適應。這些矛盾確實存在，矛盾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垃圾收費，但這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其他地區在推行收費的初期都曾有過類似問題。然而，政策推行時始終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收費與否其實並不是重點，重點是如何解決太多垃圾卻無法妥善處理的問題。

垃圾處理問題是多方面的，尤其是棄置垃圾由免費轉為收費，這些問題不可能一開始就完美解決，改善是一個漸進過程。香港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聆聽民意，逐一解決問題。

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

拜登的加沙困局



國際熱點

王震

競爭」，在中東地區試圖進行戰略收縮，包括2021年不管不顧地從阿富汗全部撤軍。但事與願違，美國在中東地區戰略收縮的意圖和布局不僅引起域內國家的憂慮與不安，還促使一些中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採取更加鋌而走險的做法。事實上，無論加沙衝突、紅海危機，還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矛盾的激化，無不如此。對拜登政府而言，基於傳統的利益和同盟關係，它很難從這些地區危機中迅速抽身，但美國在這些危機中又離不開其他世界大國的合作與支持。如果華盛頓政客繼續固守所謂「大國競爭」，緩解中東緊張局勢只會更加困難。

第二，加沙危機令拜登政府的「價值觀外交」和「人權外交」面臨困境。拜登在任內第一年就召開所謂的「民主峰會」，試圖以價值觀重塑西方陣營，並以「人權」為藉口對其他國家頻頻施壓或制裁。然而，截至4月底，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已經造成超過3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7000多人受傷，其中包括13000多名兒童和8400多名婦女，另有數百聯合國機構與人道主義援助組織成員和記者喪生。200多萬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加沙如今遍地廢墟，滿目瘡痍。在血淋淋的事實和加沙人道主義災難面前，拜登政府所鼓吹的價值觀外交和人權更像是國際社會中的滑稽劇。

第三，加沙危機讓拜登政府在美以關係上陷入前所未有的戰略困境。眾所周知，以色列雖非北約盟國，但其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卻遠超普通北約盟國。加沙衝突爆發後，拜登政府不僅默許內塔尼亞胡政府以「自衛」名義在加沙進行軍事冒險，而且不遺餘力地為其提供各種軍事援助。然而，內塔尼亞胡對拜登政府要求其約束加沙軍事行動的聲音置若罔聞，並不惜公開批評拜登政府。

事實上，儘管拜登從未中斷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但以以色列卻無法從美以關係中獲得新的安全感。加沙衝突之後，以色列領導人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應對下一次類似的非對稱襲擊，如何面對一個美國漸次撤離的新中東，以及如何面對一個反猶主義情緒不斷高漲的西方世界。

第四，加沙危機還凸顯拜登政府在巴

以和平進程陷入僵局後的困境。解決當前加沙局勢的首要問題在於如何尋求新的政治共識和政治安排，這是結束武裝衝突和�人道主義災難的前提。

首先，內塔尼亞胡政府在加沙進行軍事冒險時並未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遠景，這造成拜登政府在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面前處處被動，無所適從。

其次，拜登政府支持的「兩國方案」已遭到以色列明確反對。在巴以關係問題上，拜登政府既不敢對以色列施壓和談，也未能提出一個為各方接受的創新性政治解決方案。即便是當前拜登政府支持的「兩國方案」，在以色列定居點的侵蝕和耶路撒冷佔領被固定化等事實面前，也越來越難以落實。

最後，美國在聯合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不僅引起整個國際社會不滿，也破壞了二戰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鑒於以色列是在聯合國大會分治決議基礎上建立的國家，美國的做法無異於飲鴆止渴，只會進一步削弱自身的國際地位和權威性。

第五，加沙危機已經成為拜登尋求連任的新障礙。從歷史上看，美國猶太人在歷年總統大選中舉足輕重，而且一直是民主黨的主要票倉和競選資金來源，支持以色列也是大多數美國猶太社團和猶太院外集團的目標。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約有69%的猶太人把選票投給了拜登，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持自然會得到不少猶太選民和院外集團的支持。

然而，加沙衝突的久拖不決或會迫使拜登繼續對內塔尼亞胡施壓，危及美以之間的「特殊關係」，從而造成部分猶太人收回對拜登的支持。與此同時，美國穆斯林(將近350萬人)與左翼政治群體同樣是民主黨的票倉，如今他們對拜登政府的加沙政策極為失望和不满。顯然，對拜登團隊來說，近期美國校園內大量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議活動並不是一個吉兆。如果加沙危機長期得不到合理解決，它同樣會成為壓垮拜登連任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美聚焦」公眾號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